

据说孔子笔削《春秋》，高标准绳，寄寓褒贬，乃至后代之乱臣贼子知惧，生怕做的坏事写入史书，遗臭万年。但凡笃信儒家之说者，对此都遵信不移，虽无人具体做过统计，哪些人知惧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效果总有一些。但如何实践贯彻，则一直没有成功的典范。有之，从欧阳修始。

欧阳修出生时，宋王朝建立已近半个世纪，学术风气和社会思潮都在急遽变化，显著特征是儒学返古复兴和尊夏攘夷正统观的萌动。欧阳修出身低微，因文学才华跻身精英，领略到风气变化，也立志要引领风气。他的疑经，不拘汉唐旧注，以己意解经，开始都很早（可参拙文《欧阳修著述考》，《复旦学报》1985年第三期）。三十多岁就准备新著五代史，最初拟与尹洙合作，尹早死而决意独撰，中心主旨就是用儒家的褒贬史学，俗称《春秋》笔法，重新编纂近代史。具体做法是合五代为史，又按血统区分五代十三帝为八家，设立类传，以专事一朝者立《梁臣传》《唐臣传》，事数朝者则入杂传，又立类传，如《死节》《死事》《一行》等传表彰名节，立《唐六臣》《义儿》《伶官》《宦者》等传贬斥势利，在行文间在在处处寄寓褒贬。这当然是立意很高，据说书出后宋代士风顿时大变。虽然我总有些疑问，但陈寅恪相信，不容人不信。

但欧阳修一生似乎对此并不果于自信，直到去世都没交稿。他更困惑的是贯彻全书的褒贬笔法之微言大义，如何让读者体会他的用心。他的办法是让学生徐无党作注，在正史编纂史上开创了史书与注释同时完成的创例。就

濠上漫与

尴尬的《春秋》笔法

■陈尚君



欧阳修画像及《新唐书》

注的内容看，更似欧阳夫子自道，若北宋吴缜就认为他“授徐子为注”（《敬乡录》卷二引《五代史纂误》佚文），清人俞正燮也认为“疑欧自注而署徐名者”（《癸巳类稿》卷八《书五代史纂误》）。联系欧阳修《与澠池徐宰》所云“仍作注，有难传之处，盖传本固未可，不传本则下注尤难，此须相见可论”。大约徐是其助手，参与部分工作，即作顺水人情，注署徐名，也解决了阐发义例的难题。就全书看，徐注集中在本纪部分，列传所存寥寥，《十国世家》多说文献依据，《四夷附录》仅一则说明契丹年号，显然都属作者自述，与注者无涉。

欧阳修中年后名声大振，受委主持《新唐书》的编纂。在他以前，该书已编修多年，久无进展，欧参与后尊重原来分工，列传仍

由宋祁负责，他自领本纪、志、表部分，仍坚持《春秋》笔法，最终告竣。《新唐书》是官书，不能再请学生作注，但义例仍要阐明，这次是请参修者吕夏卿另著《唐书直笔》来说明。该书四卷，卷四为新旧书增删改易的具体说明，为“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”作全面清点，前三卷皆解释义例，可以看作欧阳修团队的集体意见，而非如《郡斋读书志》云吕氏“在书局时所建明，欧、宋间有取焉”。

五代习称乱世，不似三国还有蜀汉一脉，欧阳修要找到正反面典型都很难。正面者，《死节》其实仅得王彦章一人，《死事》稍多，《一行四人》，皆不甚著名。他特别谴责者，一是以唐社稷授梁之所谓“唐六臣”，谴责其为“庸懦不肖、倾险狡猾、趋利卖国之徒”，其

实这些人只是无实权而仰人鼻息的文臣而已；二是义儿，认为是人伦崩坏的标志，“干戈起于骨肉，异类合为父子”，其实义儿是出身孤贫的军阀仿效世族、笼络群下的手段，贵之亦过深；三是宦官，沿唐积习，五代时期恰好并不太严重；四是伶官，仅限庄宗一朝。最大的躺枪者是冯道。冯出身孤寒，积学进身，仕宦几十年，不改农家本色，在不太理想的政治环境中努力行善，他的自述诗“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”，“但教方寸无诸恶，狼虎丛中也立身”，堪称难得。周实录本传称他“在相位二十余年，以持重镇俗为己任”，至有与孔子并论者。《旧五代史》本传赞已质疑他“事四朝，相六帝，可谓之忠乎”？欧阳修更进一步谴责他“可谓无廉耻者矣”，反不如民间女子能“自爱其身”，这是责历史人物所不能。

欧阳修倡正统论，特别看重血缘宗亲的合法性，这是宋人的认识。他将后唐分为三家，即武皇、明宗、末帝各为一家，在当时并无区分，那时重在掌握军队之实力。他认为后周世宗以养子即位，另成一系，其实世宗始终未回归柴姓，在位皆姓郭，今日各历史年表皆书其名为柴荣，未必妥当。

再是梁政权之合法性。梁篡唐自立，败于后唐，其后各朝到宋，都是后唐一系的延续，直到宋真宗时修《册府元龟》，仍以梁为

闰位，否认其正统性。欧阳修不以梁为伪，在当时就很有争议，他虽举《春秋》四例以自解，总难获得共识。南宋后或干脆以南唐为正统，以中朝五代为僭夺，全不考虑本朝的合法性，走得太远了。

唐五代两部旧史，本纪都极其繁冗，初因删略实录而成。新史删繁就简，确有此必要。徐注云：“当杀曰伏诛，不当杀者，以两相杀为文。”《唐书直笔》：“将以辱命而诛，书斩于军中。”多少丰富复杂的事实，就在这《春秋》大义前变成断烂朝报了。再如命将作战，徐注云：“用兵之名有四：两相攻曰攻，以大加小曰伐，加有罪曰讨，天子自往曰征。”《唐书直笔》：“将得人，书帅师，讨有罪，书伐。”“将非其人，书王师，伐不得罪，大战书及。”“方镇违命，擅甲兵以侵軼，其首酋恶，故不书将。”秉此原则，《昭宗纪》每月都有朱全忠陷某地的记录，完全不论执行攻取的是谁，书首恶也。显然，过于讲究褒贬，有违实录传统。

我在早年甚迷欧阳修的史学，后来读了《通鉴》，方知司马光不取《春秋》笔法而务求事实真相之有识。当然，对司马光深致不满者也大有其人，如朱熹，作《通鉴纲目》比欧阳修走得更远。大儒们都有充分自信，只要坚持褒贬，必然会使作乱者良心发现，知惧而不为，殊不知燕王朱棣当然是乱臣贼子，但他成功了，子孙绵守社稷二百多年，乱臣贼子就是正统所在。那就算了吧。

还好存世文献丰富，学者可作多元解读。倘若后世仅存两部义例谨严的新史，所有人和所有事都在好、坏两边自动站队，实在很无聊。

释读黄裳自撰“简历”

■官立



黄裳自撰简历

近见黄裳毛笔书写的简历。黄裳于1953年填写的这份简历，对于了解其具体生平尤其是学生工作经历，对于编纂其年谱，均具重要文献价值。下略作释读。

籍贯：山东益都 黄裳祖籍山东益都，即今潍坊青州。黄裳到过多地，写过很多游记，但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抒写“老家”——山东。1989年11月，七十岁的他与老伴第一次回山东。从《还乡日记》看，他在济南、曲阜、泰安、青州、青岛等地待了十天（1989年11月3日至11月12日），并且直到1990年5月3日才写毕这十一篇日记。他在日记中说：“说来也惭愧，我虽然号称山东人，填写履历时也大抵如此写，可是出生地却在河北，老家一次都没有回去过。每一起，总不免歉然。现在总算有机会回故里一转了，正是值得高兴的事。”黄裳生于河北省井陉煤矿，其父是矿务局工程师。

1934.1 在天津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 黄裳在《天津在回忆里》说：“天津，对我来说实在是应该算作第二故乡那样的地方”“前前后后我在天津住了大约十年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。”在天津公学读小学。在天津南开中学呆了五年。他多次给南开的校刊《南开初中》和《南开高中》投稿，“有书评，有游记，有译文”，可惜《来燕榭集外文钞》只收了一篇，即《旅绥杂忆》。笔者最近找到一篇，即《最近翻译界的辩论》。

1938.8 抗战大暴发，来到上海；1939.10 在上海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工科；1940.9 交通大学电机系一年级；1942.11 由上海入重庆 证明人黄宗江；1943.3 入重庆交通大

学机械系 南开中学被日寇炸毁后，黄裳至沪“继续在上海中学就读，后来又考入交通大学的电机系”。珍珠港事变后，“学校从借用的震旦大学搬到中华学艺社，教室宿舍局促在一起，有屡屡听课，开学无时”。这时的黄裳“已不大听课”，要么去图书馆看书，要么和南开的同学兼好友黄宗江等在一起游玩。上海呆不下去了，黄裳、黄宗江、宋淇、周杲良商定入蜀，“我和宗江是在‘一二·八’周年的日子离沪的。路上走了一个多月，1943年初到达重庆。”

1944.1 被征调，作译员；1945.9 译员解散；1946.1 由昆明到重庆任文汇报特派员 证明人柯灵；1946.7 由渝飞沪，上海文汇报记者；1946.8 文汇报驻南京特派员 证明人

柯灵；1946.10 上海文汇报编辑 1944年初，黄裳被征调往桂林、昆明、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。回国后，被分配到贵阳，然后是解散、复员。在重庆九龙坡的交大宿舍住了许久，此时《周报》创刊，柯灵来约稿，黄裳开始写《关于美国兵》的连载。黄裳回忆：“不久，由柯灵介绍，我进了《文汇报》，成为一名记者。参加了政协会议、整军方案的签字仪式……最后回到上海，转赴南京，依旧是一名记者。晚上用长途电话向上海报头版新闻，白天则是跑新闻……不久，我又被调回上海。”在《记忆的碎屑》中，黄裳的回忆更具体：“我与柯灵交游颇早，最初是副刊编辑与投稿者的关系……1945年抗战结束，我滞留重庆，待机东归。

此际柯灵介绍我加入《文汇报》，只寄来一盒《文汇报》特派员的名片，不支薪，以通讯稿计稿酬。与此同时，他和唐弢合办《周报》，也以旧友关系频频向我约稿、催稿，我确也写了不少。其时家母弱弟留居沪上，生计艰难，不能不拼命写稿，以济家用。稿费亦由柯灵转交。”

1947.5 文汇报被封，入中兴轮船公司作文书，直至1952.7 黄永玉在《黄裳浅识》中回忆他和汪曾祺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的情景，“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，有点派头，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，关了抽屉，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，和我们就走了。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，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，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的。我看也是。”那时的黄裳收入颇丰，除了在中兴轮船任高级职员，还写文章搞翻译，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。

1949.5 文汇报复刊，仍入文汇报（兼职）；1952.7 借调至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任编剧 证明人黄宗江；1953.3 上海剧本创作所 1952年夏，黄裳被借调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任编剧，写成戏剧论文集《西厢记与白蛇传》。1953年春，被调到上海剧本创作所（该所属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领导，承担上影生产所需要的剧本）任编剧，编写了《盖叫天的舞台艺术》纪录片及故事片《林冲》。据简历可知，黄裳职别为基本编剧，等级是6，薪资数额是570元。

在“有何主要创作”栏中，黄裳提到“《一个平凡故事》（译）”，表述不太完整。冈察洛夫著的《一个平凡的故事》由黄裳翻译，1952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